

彭荆风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一九四九年七月

一九四九年七月

解放大西南

刘伯承

邓小平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进入重庆

武隆

涪陵

刘伯承

邓小平

一九四九年第三兵团和第四野战军

蒙自 石屏 元江 墨江 普洱 镇沅 宁洱 澜沧 耿马 沧源 西盟 沧源 耿马 沧源 西盟

普洱 镇沅 宁洱 澜沧 耿马 沧源 西盟 沧源 耿马 沧源 西盟

镇沅 宁洱 澜沧 耿马 沧源 西盟 沧源 耿马 沧源 西盟

宁洱 澜沧 耿马 沧源 西盟 沧源 耿马 沧源 西盟

澜沧 耿马 沧源 西盟 沧源 耿马 沧源 西盟

耿马 沧源 西盟 沧源 耿马 沧源 西盟

沧源 西盟 沧源 耿马 沧源 西盟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四日占领贵阳

四月十五日解放贵阳

四月十五日解放贵阳

彭荆风 著

解放大西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解放大西南 / 彭荆风著. — 昆明: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80695-866-7

I. 解… II. 彭…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8468 号

出 品 人: 汤汉清

责任编辑: 彭 晓 方绍忠

装帧设计: 徐 芸

责任校对: 余 祁 缪 伟 劳 木

解放大西南

Jiěfàng Dà Xīnán

彭荆风 著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制版印刷: 昆明小松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32 889mm × 1194mm

印 张: 20.5

字 数: 550 千

印 数: 1-20000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95-866-7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 一、1949年秋冬的大西南 /1
- 二、想跑快些、跑远些的国民党将军们 /17
- 三、蒋介石的“固守西南”部署 /39
- 四、“沉船”上的卢汉 /65
- 五、卢汉的以退为进 /97
- 六、“边纵”的滇西大迂回 /132
- 七、不稳定的四川 /157
- 八、不设防的川陕边境 /165
- 九、横扫贵州的三十天 /175
- 十、奇兵袭川东 /201
- 十一、浓雾散去前后的重庆 /244
- 十二、坐镇成都的蒋介石 /275
- 十三、卢汉起义 /300
- 十四、败退中的国民党将帅 /371
- 十五、成都平原的大围歼战 /436
- 十六、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围攻昆明 /471
- 十七、三千里的滇南大追歼战 /519
- 十八、陈赓兵团进昆明 /608
- 后 记 /640
- 彭荆风作品出版情况 /650

解放大西南



一、1949年秋冬的大西南

江南的七八月，暑热正盛，火辣辣的太阳把大地蒸晒得如同一个大火炉，也炙烤得人们身心都极其疲软；如果没有要紧的事，人们都尽量缩在室内或梧桐树下、柳荫丛中觅取一点难得有的清凉，但在1949年8月，六朝古都南京的工人、学生、市民却顶着烈日涌上街头，掀起了一场欢送第二野战军去解放大西南的热潮。连日来一辆接一辆的军用吉普和大卡车、一队又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陆续从郊外较远的驻地向市区内集中，像向南京人民深情告别似的，特意列队走过那些热闹繁华的秦淮河、新街口、鼓楼、玄武湖边……出了挹江门，从下关摆渡浦口往北行进。围在大街两边的人们激动地喊着口号，流着热泪，把鲜花、彩旗、慰问品献给出征的将士，有的人还是特意从远处赶来为他们的亲朋好友送别……

南京在1949年4月23日解放后，刘伯承、邓小平两位野战军统帅，考虑到这支部队今后还要去解放大西南，从战争和地方建设的需要，都要给久战之后，亟待补充和发展的部队增添新的力量，在扩军的同时，特别注意吸收知识分子入伍。这4个月当中，有成千上万的学生、市民参军，如今，他们也将分别作为野战部队或“西南服务团”的成员去参加解放大西南的战斗！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期的作战中，有过万千次出征，几乎全是隐蔽地悄悄行进，出其不意地突然出现在敌军前方或后侧；正如兵法所云：“无形，则深涧不能窥，智者不能谋。”但这次第二野战军的南征，似乎是经过中原逐鹿、淮海大战、横渡长江的几

大战役后，以战胜之师的威武姿态鼓噪前行！

平日难得露面的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也分别卸去了他们兼任的南京市市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职务，以第二野战军统帅的身份出现在这支南征大军中。和蔼慈祥的刘伯承、神情严峻的邓小平，经过津浦、陇海铁路线上的浦口、蚌埠、徐州、郑州等大小城市时，都一再与当地的党政军领导见面，召开群众大会，接受当地人民的迎送，侃侃而谈地宣讲率领第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的决心和重要意义。他们都是四川人，如今又由他们来挂帅出征西南，从革命的需要和个人感情来说都极为不同凡响。随军的新华社记者和沿途的报纸，也不断详细报道刘、邓和二野总部的行止，并通过电波传往全国各地。这重大信息当然也传到了台湾和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华盛顿……

已经退往台湾和广州的国民党军政高层都被惊动了，虽然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早在他们的意料中，但刘、邓率部西南行的消息传来，还是使他们紧张、惶恐，蒋介石连夜召集国防部和陆海空三军的首脑们会商对策。他们最关心的是人民解放军将从哪个方向攻取大西南的川、康、黔、滇？他们也很不明白：刘伯承、邓小平的部队分驻在华东各地，为什么不从浙赣铁路南下，经江西进入与川黔接壤的湖南？又为什么不利用长江水道溯江而上兵叩川鄂边境，而要绕道北出津浦、陇海进驻郑州？

他们再三商讨后，得出的判断是：如今广东、广西、湖南还有着他们国民党集团白崇禧、余汉谋的几十万军队，人民解放军在湘桂战场还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前，难以从湘黔川边界进击西南，而且那一带山川险要易守难攻，也不利于刘、邓的进军。看来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这次将以主力北向，顺川陕公路越过秦岭、大巴山脉先攻取川北；那里虽然也是山峦起伏，地势险峻，

但一向是从陆路入川的主要干道，秦汉时代就开凿悬岩绝壁修有栈道，如今更有川陕公路可通。特别是刘伯承、邓小平和第二野战军的首脑机关到达郑州后，突然销声匿迹，不再公开露面，在国民党的将军们看来，这是大战前应有的潜匿和沉默，也许刘邓己和他们的部队悄悄沿陇海线挥师西进直插陕西逼近四川了！

川陕边境的国民党军政部门也向台湾传去情报，陕西境内的人民解放军正车运频繁，有大量部队往西南移动。

台北的蒋介石统帅部、重庆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都紧张地忙开了，一再电嘱驻守川陕边境由川陕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指挥的3个兵团（第五兵团、第七兵团、第十八兵团）属下的15个军，大战将从他们那里开始，要注意调动部队，构筑防御工事，立即进入临战状态！

1949年的西南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西康、西藏5个省区和仍然保留着“陪都”名义、由行政院直辖的重庆市，面积23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约7000万。当时除了远隔雪山的西藏是由藏族上层治理外，四川省主席是王陵基、西康省主席是刘文辉、云南省主席是卢汉、贵州省主席是谷正伦、重庆市长是杨森，他们都是在当地有很深社会基础、集军政权力于一身的地方军阀，还挂着上将军衔，不过他们的部队却战斗力不强，能打仗的还是蒋介石亲自指挥的、被称为“中央军嫡系”的几个兵团。

这期间，分布于西南各省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共有40个军、85个师的建制，加上地方团队共90余万人。这比国民党军队投入淮海大战的总兵力还多30万，人数不算少，还有能帮助他们防御作战的山高水急的险要地势；这里山岭海拔之高、河流之湍急，可以说是居全国之冠，无论是入川、入藏、入云贵都要攀越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以素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四川

为例，北有高插云天的秦岭大巴山脉横亘于川陕边境，东有奔泻长江的三峡之险，川鄂湘交界的巫山、武陵山脉也是层峦起伏河流纵横；若要进入云贵高原，更是有绵亘陡峭的乌蒙山系、横断山脉的阻隔。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曾多次计划攻取西南，1942年由中缅边界入侵云南的日军，虽然在缅甸把中、英、印、缅军打得一败涂地，还是被中国军队阻止于怒江天险以西。1944年，日军曾经连续取得河南、平汉、衡宝、桂柳等战役的大胜，从北至南几乎是一泻千里地连克240余座城镇，最后也不得不止步于贵州的独山。这当中虽然有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和军事上的众多原因，但西南山川的险要，不利于日军继续入侵也是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历代王朝一向不敢轻易对西南用兵。昆明大观楼的长联中有“宋挥玉斧”之句，据传就是宋太祖赵匡胤从汉唐用兵的失败，深感对云南征讨之艰难，而用玉斧在版图上一挥，“此非朕所需之地”！虽然这传说是否可靠有争议，也可想见云南山川的险峻早已令兵家心寒。

西南五省区又以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四川最富庶，人口多，经济、文化也较其他几省发达，历代都是作为西南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中心，影响着滇、黔、康、藏。

这时候的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是由老牌政客张群担任。他是蒋介石1906年在保定军校的同学，又一起东渡日本进入陆军学校的预备班，以后成了蒋介石的密友、智囊、助手，担任过上海市长、外交部长、四川省主席、军委会秘书长、行政院长等要职，可谓一生得宠，历久不衰。他为人行事的特点是能完整深刻地领会蒋介石的意图，不折不扣全力以赴地去执行，而且没有篡权夺位的野心，使蒋介石能对他放心倚重；因为他是四川华阳人，也就有着“华阳相国”之美称。在人民解放军兵临西南的前夕，蒋介石特意让他接替朱绍良担任西南军政长官，以他的资历

和地位显然是“屈就”，但蒋介石在众多大员中再三选择后，却觉得在当前西南地方势力既相互倾轧又暗中对“中央”有离心倾向的情况下，唯有张群还能以他的声望和能力笼络各派力量。张群是个文官，手下没有一兵一卒，但川、康、滇、黔各省的地方军阀经过衡量比较后，都觉得他久离四川在“中央”做官，很少卷入西南各派系的斗争，一向对自己威胁不大，又考虑他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由他来主持西南事宜，还是比别人合适，表面上也就对他颇敬重。

张群不管军事，有关作战指挥和兵力部署，实际上还是由蒋介石亲自掌握；这期间，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管辖范围，除了云、贵、川、康四省外，还包括陕西省南部和湖北省西北部一部分地区，因为那是进入四川的两大门户，守不住就将唇亡齿寒。

驻守西南的国民党军队，除了胡宗南集团3个兵团外，另一支兵力较多的部队是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指挥的第十四兵团、第二十兵团6个军。他们对外号称18万人，实际只有14万人左右。虽然蒋介石对他们坚守川鄂通道寄予厚望，宋希濂却有自知之明，正如他所说：“这些部队，除第二军历史悠久，装备完善，兵员充足，是一支较有战斗力的部队外，其余大都是1948年下半年和1949年上半年以地方团队或师管区的新兵团编成的，装备既不好，训练也差，是没有多大战斗力的。”从而悲观地认为：“以这样脆弱的军事力量，再加上政治上的散漫和腐败，是无法和解放军抗衡的。”

其余的部队是孙元良第十六兵团的两个军驻川东，罗广文第十五兵团的3个军驻重庆附近，郭汝瑰第七十二军驻泸州，何绍周第十九兵团的两个军驻贵州，名义上归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指挥的有李弥的第八军、余程万的第二十六军以及云南保安团队6个旅，另外还有属于川康地方军阀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邓锡

侯的第九十五军、杨森的第二十军以及四川一些保安团队。

蒋介石在已经完全丢失东北、华北和江南广大地区，湖南、广东、广西势在不保的大溃败形势下，还想以这90万兵力凭借山川之险保住西南这块地盘，显示他并没有完全失去在大陆的统治，以求继续得到美国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援助并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这段时期美、英、法等国为一方，苏联和东欧国家为另一方，都在剑拔弩张互不相让的激烈对立形势来看，新的世界大战似乎有一触即发之势。蒋介石他们认为，如果战争一起，世界的形势也必然会发生剧烈变化，苏联那一方没有原子弹，一定会被消灭，中国共产党失去苏联支持还能久存？不仅固守西南有望，还可趁机大反攻。至于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将给各国人民带来多大灾难，他们是不考虑的。这就是这些军人、政客在穷途末路时的凶狠思路！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对解放战争的发展与国际形势的关系也是考虑得很多。在渡江战役以前的3月间，中共中央的部署还是“二野今后两年内留在华东不作新的机动”。以后随着渡江战役的胜利，这项决定才有所变动，由毛泽东起草、在5月23日用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名义发给各野战军的“向全国进军的部署”的电报中，指出：“二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但是这一进军任务能否顺利地完 成，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看来，还得取决于国际形势的发展，他们也担心美国会冒天下之大不韪，直接派兵介入中国的内战。那段时期，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已在1948年11月底飞往美国，正在白宫内外游说，请求再给予30亿美元的援助并直接出兵中国。据1948年至1949年这段时期，以斯大林“私人特使”身份来中国解放区与毛泽东联系的科瓦廖

夫后来回忆，1949年2月底和3月初，他曾被安排与当时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刘晓见面（按：刘晓当时是中共地下党上海市委书记，新中国建立后，曾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等要职），刘晓告诉他，他的一个朋友“弄到了一份高度机密材料，系美国制定的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方案’”，“美国准备用300万军队在中国北部和东南地区的港口登陆，日本准备把解散了的帝国军队重新组织起来，国民党则准备动员几百万军队支持美国部队……”

这个情报虽然没有得到证实，但在那时候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也不能简单地看作空穴来风，而不可不防；所以毛泽东在5月23日的这一电文中又指出：“二野目前主要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须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惧，而不敢出兵干涉。但在上海、宁波、福州等处被我占领，并最好由三野以一部分兵力协助山东攻占青岛（假如上海占领后，青岛敌军尚未撤退）以后，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小了，那时二野就可西进了。”

所以，第二野战军在渡江战役后的大追歼战中，消灭了皖南、赣东北、浙西、闽西的敌人后，除了陈赓将军指挥的第四兵团配合第四野战军继续经南昌、赣州抵达粤赣边境，准备进军广东外，陈锡联将军指挥的第三兵团、杨勇将军指挥的第五兵团都分驻于长江边的芜湖和浙赣线上的金华、上饶一带休整，一旦发生美军入侵的事，就可以迅速开赴东南沿海进行防御作战。这两个野战军，近百万人的兵力应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那是相当于淮海大战的规模，一旦打起来是相当惨烈。毛泽东把美军是否入侵的关键放在青岛，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在1945年与美国签订了《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让那里成了美国海军在远东的

重要基地，驻有美军一支庞大的舰队；如果人民解放军解放青岛时，美军加以阻拦干涉，就会酿成中美大战的导火线。

这段时间，美国也确实在密切注视着中国的内战。要不要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并在蒋介石集团的存亡关头给予紧急拨款？国会的各派势力，由于观点和政治背景不同，对这事争论得很激烈；自认在1948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有获胜希望的共和党候选人、纽约州州长托马·杜威是主张增加美援维护国民党政府在中国的统治，现任总统杜鲁门却接受了曾在中国工作多年的马歇尔、魏德迈、史迪威、司徒雷登等高层人士的看法：蒋介石政府贪污腐败严重，早已失去了民心，应该切实限制对蒋介石的进一步援助；早在1948年的5月26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直率地向美国当局正式建议，中国形势如此，必须抛弃蒋介石，他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指出：“现政府已无力阻止共产主义之传播，除非获有一受爱戴的领袖（此似无可能）能号召民众，并恢复军队之作战意志，不能希望蒋委员长能充当此种领袖。”这年冬天的10月15日，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中第一阶段丢失了锦州，败局已定，司徒雷登又在第二天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迄今仍拥护彼者（按：指蒋介石），不过其最接近之同志及若干军官而已。中国政府，尤其委员长，现在最不为人们所爱戴，指责彼辈之人，日渐增多。此时如非大规模的武装干涉，不信我方任何力量，足以避免再度军事惨败……”

在杜鲁门总统看来，这都是有根据的分析。是必须相信的。而且直接派兵入侵中国，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美苏两大国关系正紧张之时，美国的统治集团更是不敢轻易动手，只能电令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再考虑具体良策。司徒雷登在一周后的10月23日又提出5条建议：“一、倘国民政府由于屡次之军事失败，被迫迁至中国的其他地区，美国是否对之仍然承认，并予以支持？

二、是否建议委员长退休，让位于李宗仁，或其他较有希望组成一非共产之共和政府与较能有效与共党作战的政治领袖？……”

美国政府高层很欣赏司徒雷登的第二条建议，这也是他们插手别国内政时常用的手段，也就从各方面给国民党政府施加影响和压力让李宗仁能出来执政。蒋介石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失败，军队精锐丧尽，也抵抗不住这内外的压力，只能在3个月后的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但他在“引退”前就把他的心腹大将、前三军总参谋长陈诚重新起用，派往台湾担任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派他的儿子蒋经国担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准备在大陆弃守后，以台湾作为最后的基地。

李宗仁是个一向反对蒋介石的桂系领袖。1930年的“中原大战”，就组织“护党救国军”，自任总司令，联合阎锡山、冯玉祥等军阀反对蒋介石。那长达半年的战争，以阎、冯、李的失败而结束，只是后来抗日战争开始，各派系才一致联合抗日，但过去的积怨并没有消除。1948年春，国民党政府选举总统，李宗仁从北平行辕主任的任上赶来南京竞选副总统，蒋介石可不愿这个政敌成为副手，单独召见他，要他退出竞选，语气生硬地命令：“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你必须放弃。”而且说，“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还选得到？”从而遭到李宗仁的强硬反抗，因此蒋介石怒气冲冲地对他的亲信说：“李宗仁参加竞选副总统，直如一把匕首插在我心中……”但李宗仁还是依靠他桂系的力量和一部分民主人士的支持，当选了副总统。如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就写信给他，对他的参选决定“表示敬佩，并表示赞成”。

副总统有职无权，蒋介石都不肯让李宗仁担任，如今又怎肯让他以“代总统”来掌握军国大权？蒋介石的引退，也只是暂时应付美国方面的压力，同时迷惑国内外的反对派。这正如蒋介石

亲自去劝李宗仁时所说：“我看你还是出来，你这姿态一出，共军的进攻可能和缓一下。”还说，“你出来之后，共产党至少不会逼得我们这么紧。”

于是李宗仁上台了，并且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和平谈判。但实际上一切军政大权还是紧紧被回到浙江奉化乡间的蒋介石所掌握，他在溪口设立了7座电台，直接指挥参谋总长顾祝同对军队的调动，更积极地整军备战。

这就使得李宗仁这个“代总统”仍然是有职无权，令出不行，所以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也不满意地对李宗仁说：“总统先生，你是有其名无其实，政府实权完全未更动……”

李宗仁也认为：“在这种情势下，我觉得蒋先生如果继续在幕后牵制下去，就必然要同归于尽。我要挽回颓势，则必须请蒋先生放手。”

美国的杜鲁门政府担心由于蒋介石的继续掌权，会把台湾这块岛屿也丢掉，又急不可待地在1949年2月14日派出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莫成德，从南京秘密飞往台北，劝说陈诚“自立”，希望陈诚“从政治上与国民党政府分离，经济贸易和中共绝缘”；他们许诺：如果陈诚答应了，美国每年可拨给台湾经济援助2500万美元，还可以联络菲律宾、澳大利亚、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各出一部分象征性兵力，会同美国军队进驻台湾。由美国海空军负责台湾海峡的巡逻和保护。蒋介石来台湾，可以以政治避难者的身份留住……

这是明显露骨地策动台湾独立，陈诚怎敢答应！但考虑到蒋介石确实是内外交困失去了民心，如果不听美国的吩咐，自己在台湾也难以立足。何去何从？颇为彷徨，一度对蒋介石显示出了冷淡，如上海解放前的1949年5月21日，蒋介石从舟山群岛电告陈诚，他准备去台湾，陈诚却拖延了24小时没有回电，使得

蒋介石很是惊讶，不敢在5月26日直飞台北，而是先飞到不在陈诚势力范围的高雄。下飞机后，见了来迎接他的陆军副总司令孙立人，第一句话就问：“我在此地安全吗？”也可见当时蒋介石从大陆出逃时，担心众叛亲离的紧张慌乱心情。只是那时候陈诚刚刚接手台湾军政权力，还没有力量完全控制全岛局势，不是陈诚系统的那些部队又陆续拥上小岛，蒋介石才得以在台湾重新组合力量站稳脚跟。

处于孤立无援状态，又面临全面崩溃的蒋介石集团，对杜鲁门的冷漠、见死不救极为怨恨，在他的“引退”前的1948年11月恰好美国正进行总统大选，也就把希望寄托在同情他们的共和党候选人杜威的身上，希望杜威当选美国总统后，能改变他们被抛弃的处境。曾派出担任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秘书长的陈立夫专程去美国拜访，还由驻美大使顾维钧把“吉星特级勋章”授给杜威。孔祥熙的儿子孔令杰更是不惜花费巨资在美国议员中活动，杜威也发动共和党人控制的“院外援华集团”掀起了对蒋介石政府的“一揽子援助计划”，并在国会以微弱多数通过了给国民党政府10亿美元的议案。

这些活动惹得杜鲁门总统更为不满，认为是蒋介石集团用美国援助的钱来收买美国议员们，再把获得的巨额援助化为蒋、宋、孔豪门的私产。他气愤地对他的助手们说：“我敢和你们打赌，我们的10亿美元贷款，今天依旧存在纽约的中国银行里（当时的中国银行是被孔祥熙所控制）。”

但美国的政治格局并没有如蒋介石他们希望的那样变化。

杜鲁门在大选中击败了杜威，正式当选总统（在这以前他是由于罗斯福总统的去世，以副总统继任总统），也就更为明显地冷淡蒋介石集团，还对在美国活动的蒋夫人宋美龄大加嘲弄：“她来美国是想多讨些施舍。”“我不会像罗斯福那样让她住在白

宫。我想她会很不高兴的。但她高兴不高兴，我可不在乎。”

（抗战期间的1943年2月宋美龄访问美国时，被罗斯福夫妇作为贵宾请进白宫住下，罗斯福夫人关切地说：“我很愿意帮助她，照料她，把她当作我的女儿一样。”罗斯福总统还邀请她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从而加速了美国对中国抗战的军援。）

就连那位曾经来中国参与国共调停，和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私人交情很好的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这次虽然礼貌地招待了宋美龄，但迫于美国政坛的形势，也不得不公开表示：“我不代表政府，只是以私人关系接待宋美龄。”人情如此冷暖，使宋美龄很是失望，悲切地在电报中向蒋介石诉苦：“这里谁也不欢迎我！”

1949年5月，杜鲁门总统不仅拒绝了蒋介石政府“迅速给予军事援助，并发表美国政府之坚定声明”的要求，反而命令美国联邦调查局，对外间传说很多的孔、宋两家族在美国曼哈顿银行存贮了20亿美元一事进行秘密调查。虽然这一调查后来没有确切结果，杜鲁门还是忍不住破口大骂：“他们都是贼，个个都他妈的是贼……他们从我们给蒋送去的38亿美元中偷去了7亿5千万美元。他们用这笔钱在圣保罗搞房地产投资，他们有的房地产就在纽约市……就是那笔钱他们先前用来支持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现在还是用那笔钱来支持他们。”

杜鲁门总统这样激愤地对待蒋介石，并不是他思想左倾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而是由于蒋介石集团的失败，影响了他的政治声誉，使他遭到了他的政敌共和党的激烈批评，责怪他对蒋介石集团支持不够，从而让中国共产党得势。他实际上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在这同时，为了给自己辩护，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艾奇逊在1949年8月5日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详尽地叙述了自1945年至1949年的5年当中，美国实行扶蒋反共

政策，给予蒋介石政府种种援助的经过，以表示他们不是不帮忙，而是蒋介石政府太无能。艾奇逊在白皮书中坦率地指出：“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是不幸的事，却也是无可避免的。在我国能力所及的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所做的以及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无法改变这种结局；这种结局之所以终于发生，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少做了某些事情。”

艾奇逊在详细列举了美国对蒋介石政府的各种援助，特别是总数高达 38 亿美元军援的巨大金额之后，又解释他们为什么不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以帮助国民党毁灭共产党。他说：“从理论上来看，以及回顾起来，虽然都似乎是令人神往，却是完全行不通的。战前的 10 年里，国民党已经毁灭不了共产党。现在是战后了，国民党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从国民党军队后来所表现的不中用的惨况来看，也许只有靠美国的武力才可以把共产党打跑。对于这样庞大的责任，无论是叫我们的军队在 1945 年来承担，或者是在以后来承担，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所以，他们只能采用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集团出人出力来进行这场大规模的中国内战的策略。

中国国共两党的斗争，却会惹来远在太平洋彼岸美国统治集团的插手，可见已影响着世界局势。

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这一场激烈争吵，被睿智的毛泽东看清楚了，虽然他们咒骂中国共产党为“极权政府”，并把中国的未来寄希望于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但已明显昭示杜鲁门这一派目前只想来个“君子动口不动手”，具体的表现则是人民解放军在 1949 年 6 月 2 日攻进青岛时，美国海军的几艘军舰作出了一番示威的恐吓姿态后，却乖乖地开走了，一场可能酿成中美大战的武装冲突并没有发生，以致蒋介石在 7 月 16 日的广州国民党中常会上极为不满地抱怨“美国政府已对我们采取旁观